# 孔子何以入世家

李　霖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孔子何以入世家,关键不在于真实的孔子,而在于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综观《史记》全书,太史公对孔子的定位不是道德的完人,而是王道的传承者。《孔子世家》的两大主题为政和六艺,均围绕王道展开:求仕、为政是为了推行王道,结果因与“力政”的世风格格不入而失败;修六艺、作《春秋》是为了将王道传诸后世,使“后有王者举而开之”。结合《史记》各世家小序对辅弼主上之义的强调,可知《史记》入孔子于世家的真正用意,在于刻画孔子对王道的辅弼。孔子所传“世”的,不在于子嗣、爵位或仁德,而在于承载王道的六艺。以继孔子为志的司马迁,也自任为王道的传承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僭越者。

**关键词：**《孔子世家》;司马迁;王道;春秋学

**中图分类号：**K 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5)06-0102-13

尽管《史记》出世不久即遭致“是非颇谬于圣人”这样尖锐的批评,①但种种迹象表明,《史记》全书对孔子的重视程度可谓无以复加:《孔子世家》赞语称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以外,《史记》引用孔子语录亦多达十条以上,②且时代相涉的本纪、世家频见孔子生、孔子相鲁、孔子卒等记事,为全书罕见之特笔;③《十二诸侯年表》更以孔子卒作为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④《史记》战国以前的核心史料,正是与孔子关系密切的六艺……不一而足。其中,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是孔子得以入世家,而老庄孟荀等诸子入列传,后者只得与仲尼弟子同列。

孔子何以入世家？两千年来,学者议论不一。⑤ 对于世家这一体裁的初衷,唐人司马贞的看法几乎成为公论:

> 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⑥

把世家理解为君位得以世袭。吴太伯、仲雍死后,其子孙亦为吴国国君;留侯张良死后,其子亦为留侯。各世家多如此,惟孔子、陈涉没有君位留给后人继承。

---

**收稿日期：**2025-01-31

**作者简介：**李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诗传笺》经学体系研究”(23BZW037)。

①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37—2738 页。又《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谓太史公“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第 3580 页。

② 例如《伯夷列传》中的一系列追问,多由孔子语录而发,所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史记》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2574 页),更使“名”成为七十列传的关键词。

③ 类似的特笔,还有秦襄公始列为诸侯等。

④ 太史公自道《十二诸侯年表》的起止时间是“自共和迄孔子”(《史记》卷十四,第 643—644 页)。准确地说,是以孔子卒(479BC)后两年,作为是十二诸侯时代的结束,下一年(476BC)是六国时代的开始。

⑤ 学术史回顾可参见姜鹏:《公羊学背景下的〈史记·孔子世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第 123—125 页。

⑥ 司马贞:《史记索隐》,《史记》卷三一,第 1739 页。其他类似说法,如明人郝敬《史汉愚按》卷三云:“胙土世禄,谓之世家。”

值得重视的是,《孔子世家》赞语末尾,很可能是太史公对孔子何以入世家的回答:

>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①

不少学者以为此段的重点在"孔子布衣,传十余世"。例如司马贞说:"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②所谓"代有贤哲",也许是抓住了赞语中的"传十余世",③却忽视了真正关键的信息"六艺"。在司马迁的时代,孔子及其哲嗣尚未获得朝廷册封,小司马仅仅止于"代有贤哲",虽未中的,却也未至于大谬。至明人何良俊,认为太史公预料到了孔子将获册封,故而为其立世家:

> 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④

则近乎臆测,距离史迁原意愈远。⑤ 此类说法颇具代表,钱穆即以"衍圣公"的存在称赞"太史公见解之伟大"。⑥

实际上,要回答"孔子何以入世家",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甚至不在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而必须以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为准绳。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太史公,《史记》之外的材料和说法(包括公羊说)只能备参考。同时,我们也不能局限于《孔子世家》,而必须在《史记》全书的语境中重新定位孔子。

## 一、《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

《孔子世家》以外,《史记》集中讨论孔子有三处,清楚地呈现了太史公眼中的孔子形象。一是《十二诸侯年表》序:

>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⑦

二是《儒林列传》序:

>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⑧

三是《太史公自序》:

---

①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 2344 页。
② 司马贞:《史记索隐》,《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 2297 页。下文引用《孔子世家》不再标注页码。
③ "传十余世"指《世家》篇末由孔鲤至孔欢十四代。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在"传十余世"下有"至于今不绝"。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4 页。
⑤ 何良俊指出世家所世的不必是爵土,则颇具启发。
⑥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在春秋时,并没有封孔子一个国,孔子也没有土地传子孙,而且也不能像张良、萧何般有爵位传下,怎么太史公却来写《孔子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吗?但我们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见解之伟大。我们今天来到台湾,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在台湾。可说在中国,只有此一世家永传不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72 页。
⑦ 《史记》卷十四,第 641—642 页。
⑧ 《史记》卷一二一,第 3759 页。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①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 王道之大者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②

三处表述虽有详略之别,论调则如出一辙,都以“王道”言孔子。“王道”也可称为“王路”“王事”“王法”“周道”。“周道”指周的“王道”,一如《史记》称夏、殷之王道为“夏道”“殷道”。③ 何为王道?《史记》从未明确地定义王道,笼统地讲,王道既指德行,也意味着地位、秩序。④ 王道的德行义,早已成为共识。《十二诸侯年表》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就是讽刺天子失德。王道的秩序义,讨论相对较少,却是理解《孔子世家》的关键,有必要在进入正题之前稍作归纳。

玩《史记》文意,周文王、武王等圣王治国之道就是周的王道,⑤成、康所行,也合乎王道。⑥ 昭王时“王道微缺”,⑦穆王时“王道衰微”,懿王时“王室遂衰”,夷陵至于厉王,剧变终于发生。

厉王的无道违背了王道中的王“德”。《周本纪》说厉王好利,⑧大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厉王又弭谤,导致“诸侯不朝”,⑨其后“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⑩ “乃”字表明太史公认为国人所以叛王,根本原因在于厉王弭谤的失德行为。《三代世表》“厉王胡以恶闻过乱出奔,遂死于彘”,⑪《十二诸侯年表》序“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都用“以”字强调厉王咎由自取。更重要的是,厉王出奔带来的后果。如《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大臣共和行政,首次撼动了周室的王“位”,即“天子——诸侯”的君臣秩序。正是在此意义上,《史记》以共和行政为周之王道衰废的标志,由此开启了“十二诸侯”的“力政”时代,⑫即“政由强国”“王路废而邪道兴”,天子名存实亡。

“力政”是“王道”的反面。⑬ 由于“力政”成为十二诸侯时代的主题,“明王道”的孔子要想通过从

① 标点本以“子曰”以下为太史公语,笔者据“子曰”及下文“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等内容与《春秋繁露·俞序》合,判断其皆属“余闻董生曰”,故调整引号断限。

② 《史记》卷一三〇,第 3975、3977 页。

③ “夏道”见于《匈奴列传》,“殷道”见于《殷本纪》《三代世表》。

④ 陈苏镇指出,尧、舜、禹、汤、文、武等“王者”治理天下的方式被称为“王道”,王道就是儒家倡导的仁义礼乐体系,汉儒将其概括为“德教”。参见陈苏镇:《说“王者”:汉儒对皇帝角色的期待与构建》,《北大史学》第 25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 页。

⑤ 据《周本纪》“穆王即位,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史记》卷四,第 172 页),知文、武之道是王道。

⑥ 《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卷四,第 171 页。

⑦ 尽管汉代《诗经》官学以《关雎》刺周康王晏起,似乎意味着《十二诸侯年表》“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认为周道缺始于康王,然而考虑到《周本纪》对康王没有任何负面评价,至康王卒后“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应认为太史公以周道缺始于昭王,所谓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可视作用典,不必完全遵从《诗》家之说。

⑧ 其史源《国语》未明言厉王本人好利。

⑨ 其史源《国语》不言“诸侯不朝”。《史记》常常用诸侯归附表达得天命、诸侯不朝表达失天命。

⑩ 《史记》卷四,第 179、181 页。

⑪ 《史记》卷十三,第 633 页。

⑫ “力政”的主体是诸侯。此语又见于《秦本纪》“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史记》卷五,第 253 页),《天官书》“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史记》卷二七,第 1595 页),《陈杞世家》“幽、厉之后,诸侯力政相并”(《史记》卷三六,第 1907 页),《南越列传》汉武帝诏“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史记》卷一一三,第 3577 页)。《十二诸侯年表》小序作“诸侯专政”,《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 3981 页。

⑬ 相比力政,《史记》中的霸道并非与王道完全对立。霸道也是一种秩序,也具有“义”的原则。

政(“干七十余君”“为鲁司寇”)来实现抱负,无异于方枘圆凿。《史记》在“莫能用”和“无所遇”前均冠以“是以”,意在强调为政失败的必然性。

为政失败,尤其是西狩获麟,意味着王道已不可为。但孔子没有放弃,仍寄望于将来。作《春秋》以传承王道,希望“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成为孔子实现理想的必然选择。《史记》谈到孔子作《春秋》,每冠以“故”字,即在于强调作《春秋》的必然性。

简言之,《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是王道的传承者:明王道的孔子与那个王道衰废的时代格格不入,孔子致力于从政,却注定无法实现王道,最终只得通过《春秋》把王道留给未来的王者。明乎此,方能读懂《孔子世家》对孔子的刻画。

## 二、《孔子世家》的主题

《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有两个主题所占篇幅最多,《世家》对孔子形象的刻画即主要围绕着这两大主题。一是求仕、为政,包括在鲁和周游列国,二是修六艺、作《春秋》。与此相适,《世家》所选夫子语录,也主要针对为政和六艺两方面的内容。今本《论语》中最为多见的那些关于仁孝忠信等个体德行的条目,几乎未见于《孔子世家》。太史公对孔子的定位并非道德的楷模,而是王道的传承者。

尽管《世家》很少提及王道,但这两大主题正契合《史记》全书对孔子作为王道传承者的定位:求仕、为政是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王道,修六艺、作《春秋》是为了将王道传诸后世。

### (一)求仕、为政以行王道

与《论语》极为不同,《世家》中孔子最突出的形象是汲汲于求仕。为了求仕,孔子不惜在服丧期间试图参加季氏的宴会、通过做高昭子家臣以通齐景公,甚至曾打算投奔公山不狃、佛肸等叛臣。后儒带着道德楷模的成见阅读《世家》的这类记载,常常怒不可遏,指责太史公“厚诬圣人”。实际上,这些记述不可能有意贬低孔子,而是旨在刻画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曲折历程。

与那些看似“不择手段”的求仕经历大相径庭的,是孔子厄于陈蔡时,在与子路、子贡、颜回的三轮问答中所展现的不阿时俗。针对一众师徒所陷入的绝境,孔子以“吾道非邪”设问,三位弟子作了不同的应答。子路怀疑是夫子之道不够高明导致众人受困绝粮,孔子便以伯夷、比干的事迹教训了他。面对同样的提问,子贡的前一半回答“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合夫子之意,但他接着劝夫子不妨“少贬”其道以取容,被批评“不修尔道而求为容”。最后,只有颜回的回答“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令夫子欣然而笑。夫子的欣然,也意味着太史公对颜回的认可。

上述问答未见于《论语》,近人往往未予重视。① 这三轮问答不论是否曾真实发生,②却无疑合乎太史公对孔子的认识,甚至可视为《世家》求仕为政这一主题的核心事件。子贡的前一半回答,正契合《史记》对孔子的定位,明王道的孔子在客观上注定不容于毁弃王道的时代。③ 而颜回的回答,则道破了孔子从政失败的主观原因:孔子绝不肯为了从政而稍稍贬损王道。

与孔子如出一辙,太史公笔下的孟子处于务在强兵并敌的时代,却致力于述唐虞、三代之德(王

---

① 学者多指出陈、蔡大夫不可能合谋围困孔子,从而质疑《世家》此段记载失实,如朱熹《论语序说》、全祖望《经史问答》等。《世家》此段中的“君子固穷”和“一以贯之”等见于《论语》的内容,其相关注解汗牛充栋;相比之下,三轮问答则自清代以来少有人文津,可能是因为三轮问答又见于乾嘉以来疑为伪书的《孔子家语》。

② 三轮问答必有所本。其中子路的质疑和夫子以伯夷、比干事迹作为回应,又见于《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

③ 此外,孔子在回应子路时,对伯夷、叔齐的定位,也颇契《伯夷列传》意指。

道),故而注定不见听用,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① 太史公将孟轲困于齐梁与仲尼菜色陈蔡等事相提并论,说他们的不阿世苟合犹如"持方枘欲内圜凿"。② 方枘圆凿之喻,除了把个人与时代在客观上的格格不入具象化,更意在强调孔、孟从主观上绝不会为了取合当世而修理王道本来的棱角。也许正因为如此,孔子才堪担负传承王道的使命。

由此,方得理解《世家》中汲汲于求仕的孔子,为何一旦不得卫灵公、齐景公、尤其是季桓子器重,便毅然离去。凡此都应理解为孔子主观上不肯为了从政而贬损王道。《孟子荀卿列传》即举"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作为拒绝阿世苟合的事例,正可解释《世家》中孔子去卫的原因是灵公问兵而不问礼,兵是力政之事,礼则属于王道。③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论语》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而《世家》在孔子答语后,作"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增多了卫灵公不能用孔子之事。无独有偶,在鲁为政作为孔子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对于此次去鲁的原因,《论语》作"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是不能用孔子,《世家》则增多了季桓子"不致膰俎于大夫"这一理由,即礼(礼属王道)的废弛。依此类推,此前孔子去齐的真正原因,当是齐景公原本对秦穆公所行王道产生兴趣,并服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论(秩序属王道)而欲重用孔子,后被晏婴劝阻而"不问其礼",④转而对王道失去兴趣,且一曰"以季、孟之间"待孔子,一曰"吾老矣,弗能用也",明言不能用孔子。要之,对于孔子这三次去卫、去齐、去鲁的理由,太史公都突出了主政者的两项因素,一是对王道失去兴趣,一是不能重用孔子:这正是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客观原因。如能理解孔子从政失败的主、客原因,便知孔子去齐主要不是由于"齐大夫欲害孔子"带来的威慑,否则也与夫子自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及"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牴牾。⑤ 在《世家》的语境中,这里的"德"与"文"不妨理解为王道。

对于孔子的汲汲求仕与毅然离去之间的张力,也许隐者长沮、桀溺是理解的,他们劝孔子莫与世人同流合污,宜归隐山林。桀溺说:"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对于世道之污浊,孔子没有异词。但与隐者不同的是,正是由于天下无道,孔子才渴望通过从政来实现王道。可以说,孔子的理想是使天下恢复"王"应有的秩序,即拨乱反正。

太史公对孔子王道理想的认识,较容易观察的,是孔子为政期间的举措,以及给主政者们的建议。《世家》叙述孔子在鲁为政前,"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国君、大夫、陪臣的秩序颠倒。鲁定公八年,陪臣与大夫之间的冲突加剧。九年,孔子欲投奔陪臣公山不狃,终未成行。其后,孔子受君命,先后为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十年,孔子相,⑥鲁君会齐侯于夹谷,使齐之优倡手足异处,⑦于是齐侯归鲁侵

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第 2833—2834 页)"是以"强调其必然性,与"是以"孔子"无所遇""莫能用"的逻辑一致。

② 《孟子荀卿列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此"指代驺衍。《史记》的丰富之处在于,尽管太史公赞许孔、孟的不阿世俗,但也不认为驺衍"游诸侯见尊礼"是有意苟合。

③ 《礼书》小序认为礼可以通王道,见《太史公自序》。

④ 《世家》"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可能是其史源的《墨子·非儒》作敬见而不问其道。

⑤ 与去齐有所不同,孔子食六万粟居卫期间,《世家》记载:"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史记》明言此次去卫的理由是"恐获罪"。不过,孔子仍然"居十月"乃去。

⑥ 对于夹谷之会的孔子相,杜预、崔述等不少学者认为孔子只是相会仪,而并非行国相事。然而,由《十二诸侯年表》《吴世家》《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魏世家》《伍子胥列传》记此年孔子相鲁,《秦本纪》《鲁世家》谓孔子行相事,可知太史公以孔子行国相事。《世家》下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亦当如此理解。

⑦ 《孔子世家》中的夷狄之乐、优倡侏儒,《齐世家》作莱乐、莱人,《鲁世家》作淫乐。

地。《世家》叙夹谷之会,兼采《左传》《穀梁》《新语》的不同叙述,而特别强调礼乐和武备。① 十三年,②孔子奉君命堕三都,试图趁三桓与陪臣内讧之际,用武力匡正国君、大夫、陪臣的秩序,最终功败垂成。十四年,孔子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③孔子去。

由《世家》对孔子在鲁为政的叙述,结合前述孔子事卫灵公、齐景公及去鲁时强调“俎豆之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致膰俎于大夫”,此外又劝卫灵公伐蒲,可知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君臣(及父子等)应有的秩序,④拨乱反正,使其名实相副。礼乐是该秩序的准则,武力是该秩序的必要保障。这也是太史公对王道的理解。

其中容易招致争议的,如孔子斩齐优、⑤诛少正卯,⑥与孔子仁者的形象有所不合,凡此,皆可在太史公的王道观中获得理解。孔子动用武力,都以恢复秩序为目的:斩齐优以维护雅乐,诛少正卯以除奸,堕三都以使陪臣统于大夫、大夫统于国君,劝卫灵公伐蒲亦然。卫大夫以蒲叛卫,灵公欲借蒲邑抵御晋楚,是权衡利益的“力政”思路;孔子力主伐蒲,完全是为了捍卫君臣秩序。明乎此,则知《世家》载夫子劝灵公伐蒲,与不答灵公问陈、不答孔文子所问攻太叔之策并不冲突,⑦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武力,而在于武力的出发点是王道秩序还是“力政”。

《世家》中的孔子不仅招致后人的争议,也常常不为时人理解。将孔子推行的王道视为霸道,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孔子获得鲁君任用不久,齐大夫即警告景公:“鲁用孔丘,其势危齐。”《齐世家》作:“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⑧孔子与闻国政、鲁国大治后,齐人惧,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遂定计使孔子去鲁。⑨ 陈蔡大夫与齐人的反应如出一辙,也认为:“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因有陈蔡之围。尤其明显的是,楚昭王欲封孔子时,楚大夫阻拦道:

> 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 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⑩

楚大夫明确地将文、武之王道视作会危及别国的霸道,昭王只得作罢。《史记》屡屡记述孔子之道令时人感受到“危”“惧”“霸”,这样的错位使孔子的仕途举步维艰。实际上,这些措辞往往未见于已知的《史记》史源,应是太史公刻意提示王道理想与力政现实之间存在着荒谬的错位。

汉人已不解太史公此意。在动念投奔公山不狃的夫子自道中,《世家》夹杂了未载于今本《论语》的话语:

> 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

东汉桓谭以《史记》此语为诬孔子,⑪可能是把“王”误解为称王、建立政权。太史公当然不可能认为孔

---

① 《左传》《穀梁》《新语》皆谓齐人欲以兵劫鲁君,《史记》改为齐人奏夷狄之乐,又较之增多孔子强调“武备”、因具“左右司马”之语。又,《齐世家》谓孔子“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也强调礼。

② 《鲁世家》及《春秋》在定公十二年。

③ 齐人归女乐事,《十二诸侯年表》及《鲁世家》在定公十二年。

④ 即《世家》“《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⑤ 例如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以为“上诬圣人,不可训也”(合肥:黄山书社 2005 年版,第 605 页)。

⑥ 例如《朱子语类》卷九三云:“某尝疑诛少正卯无此事,出于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352 页。

⑦ 《世家》载:“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事详《左传》哀公十一年。

⑧ 《史记》卷三十二,第 1812 页。

⑨ 《韩非子·内储说下》载“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黎且因遗哀公女乐以去仲尼。

⑩ 另见于《说苑·杂言》。又,学者多质疑此事的真实性,例如《朱子语类》卷十九云:“昭王之招无此事,邹鲁间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第 445 页)

⑪ 《史记索隐》云:“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也。”

子有称王的企图。结合《世家》下句:

> 夫召我者岂徒哉? 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此句又见于《论语》,“为东周”,先儒多理解为兴周道于东方,那么上句的“王”,当以行王道解之。在《史记》语境中,这是孔子意欲施行王道的宣言。施行王道要依托于政权,为此孔子甚至欲仕于叛臣,但毋需自己称王。

对于《史记》所刻画的孔子“干七十余君”以推行王道的形象,最生动的譬喻当属“丧家之狗”。在《韩诗外传》中,“羸乎若丧家之狗”是他人以尧、舜、禹、皋陶四圣为模范对孔子的品评。孔子辞不敢当,并解释道:

> 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 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①

《韩诗外传》的“丧家”以主人丧亡喻指王道失坠、天子名存实亡,这与《史记》全书对孔子的定位若合符契。与《韩诗》不同的是,《史记》中的孔子并未推却“丧家狗”之喻,而是为之欣然而笑,似乎意味着太史公认为孔子的自我期许正是在“顾望无人”即王道衰微、莫之纲纪之时,汲汲于以“狗”一般的微贱之身“意欲施之”,②即施行王道。③

孔子自信可以用王道救世:“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怎奈主政者“莫能用”。诚如明儒陈仁锡所说:

> (《孔子世家》)以“不用”二字为关键。曰“弗能用”,曰“莫能己用”,曰“不用孔子”,曰“既不得用于卫”,曰“鲁终不能用孔子”,皆叹夫子道之不行也。④

孔子求仕、为政的终点是:

> 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不求仕”,意味着孔子放弃为政。《世家》转而记述孔子修六艺、作《春秋》以达王道之事。⑤

**(二)修六艺、作《春秋》以达王道**

对于修六艺,《世家》先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作为背景,提示诗、书、礼、乐与王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在“《书传》《礼记》自孔氏”后,又言《诗》经过孔子编订、弦歌,则:

>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足证诗、书、礼、乐可以“备王道”。又在此之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之前,谓“孔子晚而喜《易》”,意味着作为六艺之一的《易》,也可以“备王道”。

---

① 《韩诗外传》卷九,北京:中国书店 2021 年影印明刻本,第 316—318 页。

② 与拙见不同,有学者认为《史记》中丧家狗的涵义与《韩诗外传》不同,参见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北京:中华书局 2022 年版,第 17 页;王刚:《“丧家狗”与思想建构:汉、晋间文本的考察》,《华中国学》2020 年春之卷,第 92—122 页。笔者认为,尽管《论衡》《白虎通》和《孔子家语》对丧家狗的叙述远比《韩诗外传》更接近《史记》,《史记》不必以《韩诗》为史源,但没有证据表明《史记》《论衡》《白虎通》《家语》对“丧家”的理解不可以是主人丧亡的意思。

③ 《史记》“累累若丧家之狗”,“累累”训为羸惫,则丧家狗不具“素王”之义。

④ 《史记会注考证》卷四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01 页。

⑤ 《世家》在孔子晚年返鲁而“不求仕”之后集中记述孔子修六艺之事,主要是出于叙述的便利,并非认为此时始修六艺。无论是《儒林列传》序“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世以混浊莫能用”,还是《世家》叙孔子在鲁为政前,“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又,孔子作《春秋》的时间,《史记》有西狩获麟和厄陈蔡两说。

孔子除了用诗、书、礼、乐、易以备王道,更重要的是作《春秋》以达王道,①这在《史记》全书中一以贯之,已如上章所述。《世家》对《春秋》与王道的关联虽无明文,也当作如是观。

《世家》对孔子作《春秋》的相关叙述,多本于《公羊传》及董仲舒说,又有所不同。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公羊家以为天将亡夫子之证;及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公羊家以为受命之符,以及天告夫子将没之征。考《世家》下文:

>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太史公所谓“没世”,当对应“天丧予”,与公羊说一致;而“吾道不行矣”,正是太史公对“吾道穷矣”的理解,②那么“吾道”指的是孔子所奉王道,意思是西狩获麟宣告了王道无法在当下施行,孔子遂作《春秋》以当王法——这与公羊家的阐释有所不同。

其微妙的区别在于,公羊家把孔子视为王道的担当者,以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当新王,以孔子为“素王”;而综观《史记》全书,太史公更倾向于把孔子视为王道的传承者,似乎没有全盘接受受命、素王等公羊说。《世家》在西狩获麟下加入《公羊传》所无的“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③或可解读为太史公对受命说的排斥。④《史记》疑似以《春秋》为一王的表述“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⑤乃侧重于前朝失道,未必具有受命之义。实际上,考察《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秦本纪》乃至《史记》全书,均未见符合公羊“以《春秋》当新王”的明确证据。⑥ 由此始得理解,《世家》何以只说“据鲁”,不说“王鲁”。

在《史记》中,孔子可能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为政的挫败,尤其是西狩获麟,方令孔子意识到王道在当下的破灭。在个体生命终结之前,使王道得以传诸后世,是孔子的使命所在。修六艺尤其是作《春秋》以达王道、当王法,成为孔子的必然选择。《春秋》的王道、王法,非如《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样即刻生效,而是如《世家》所说“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未来圣王行用《春秋》时,王法始得发挥效力,⑦王道始得真正实现。

## 三、孔子入世家之义

《史记》对孔子的定位,既非太史公的发明,在汉代也并不十分独特。《史记》刻画孔子的关键词如莫能用、王道、六艺,早已见于《庄子·天下篇》:

>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

后来又被汉代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发扬光大,成为太史公的知识背景。尤其是向来认为最具太史公个人色彩的赞语,其《孔子世家》赞语:

---

① “达王道”出自《世家》小序“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又《自序》引董生谓《春秋》可以“达王事”。

② “吾道穷矣”和“吾道不行矣”可以呼应《世家》上文的“天生德于予”和“天之未丧斯文”。

③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对策曰:“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第 2503 页)认为孔子无位,没有机会如圣王一样致太平。

④ 郑玄《论语》注云:“有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者,伤不得见用也。”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5 页。

⑤ 《史记》卷一三〇,第 3989 页。

⑥ 例如在《十二诸侯年表》中,鲁国为十二诸侯之一,笔者认为周和秦不属于诸侯。又,上章引《自序》以《春秋》“当一王之法”的表述,乃是出自壶遂之口。

⑦ 参见阮芝生:《论史记中的孔子与春秋》,《台大历史学报》第 23 期,收入氏著《史记的读法》,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52 页。

>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几乎完全一致。① 如果孔子衣镜不以《史记》为史源,则这段赞语就是对成文的复述,②不是太史公的独见。

相比之下,最具《史记》特色的,正是本文的核心议题:入孔子于世家。经过上文的分析,结合《世家》赞语以及小序:

>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对于孔子何以入世家,太史公的考虑可能在于: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具有辅弼王道的功绩。

**(一)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对于《史记》“世家”之名义,一般认为所“世”的是君位。这一理解不能契合孔子和陈涉,也没有《史记》明文作依据。实际上,《孔子世家》赞语和小序都提到的“六艺”,才是太史公明言孔子所“世”者。汉代“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就是孔子得以世家的明证。一如太史公明言陈涉的历史意义在于首事反秦:

>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③

故而陈涉所“世”者,乃是反秦的事业。陈涉死后,“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最终建立的汉朝,就是陈涉得以世家的明证。④

要之,世家所“世”者,未必是君位,也可以是某项功业。⑤ 孔子所“世”的,不在于子孙“传十余世”,太史公更不可能预知孔子及其哲嗣会获得册封。在史迁等汉人看来,孔子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功业无疑就是六艺。六艺之文辞作为“达王道”的载体,具有“匡乱世反之于正”的效力。此即孔子“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之义。

**(二)辅弼王道**

上文分析了世家所“世”对象这一字面含义。更重要的是,《太史公自序》对于世家这一体裁的功能已有明确的界定:

>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⑥

指出世家是辅弼“主上”的股肱之“臣”。验之三十世家,除《孔子》《陈涉》之外,各世家在周为诸侯,在汉为或为诸侯王、或为社稷之臣(侯)、或为皇后,无不具有佐助王室、辅弼王业之义。只不过有时流于表面、名不副实。⑦ 公然谋反或有谋反之迹的,则退为列传。⑧

世家对王室的辅弼,是理解《史记》全书的一条线索。三十世家的小序,或多或少都与此相涉。尤其是小序“嘉”字二十见,全部施于世家,且无不针对“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辅弼之义,堪称《史记》的

---

① 王意乐、吴振华:《孔子衣镜初读》,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68 页。

② 此外,孔子衣镜对孔子事迹的叙述框架也与《史记》相近,只是一些细节存在较大差异。

③ 《史记》卷一三〇,第 3989 页。

④ 参见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第三章第二节,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年版。

⑤ 赵生群指出“世家的内涵,是指某种事业后继有人”(第 52 页),令笔者深受启发。但赵先生反对世家必须具有辅弼意义(第 56 页),笔者未敢苟同。

⑥ 《史记》卷一三〇,第 3999 页。

⑦ 最为牵强的赵、魏、韩、田齐,也获得周天子册封,在名义上有拱卫周室的职责。

⑧ 例如《淮阴侯》《吴王濞》《淮南衡山列传》。

一种“书法”。标“嘉”字的小序有:

> 太伯避历……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 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 辅翼成王,诸侯宗周……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 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 收殷余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嘉彼《康诰》,①作《卫世家》第七。
> 嘉微子问太师,②作《宋世家》第八。
> 嘉文公锡珪鬯,③作《晋世家》第九。
> 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嘉庄王之义,④作《楚世家》第十。
> 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 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 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 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 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⑥作《韩世家》第十五。
> 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⑦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 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
> 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二十。
> 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 与信定魏……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 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⑧

这些鲜有学者措意的“嘉”字句,实系太史公自道世家的关键所在,有望借此深入理解世家的入选标准,从而揭示孔子入世家之义,故须在此略作探讨。

前七篇的“嘉”字对应西周,褒扬吴太伯、齐太公、召公奭对王朝创业的功绩,以及周公旦对王室的忠心、蔡仲对其父叛乱的悔过、卫康叔对周室之命的遵从,尤其有趣的,是对微子去殷的褒扬。这些“嘉”字句,均针对辅弼或忠信之义。

末五篇对应汉代,“嘉”字褒扬皇后、楚元王、齐悼惠王、梁孝王辅弼王室的功德,以及曹参的“忠信”。其中最有趣的,是对曹参的评价“不伐功矜能”,明显与韩信形成对照。对于以谋反论处、《史记》

---

① 《卫世家》记载,周公平管蔡之乱后,以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为《康诰》《酒诰》《梓材》以命康叔。康叔之国,既以此命,以和集其民。

② 《殷本纪》《宋世家》记载,纣淫乱不止,微子说谏不听,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遂去。

③ 《晋世家》记载,城濮之战获胜后,晋献楚俘于周,天子命晋文公为伯,锡珪鬯。

④ 《楚世家》记载,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即县之,申叔时责庄王曰:“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秦本纪》记载,楚庄王服郑,楚霸,为会盟合诸侯。

⑤ 《越世家》记载,句践已平吴,致贡于周,周元王赐句践胙,命为伯。

⑥ “匡周天子之赋”是为诸侯盟主、奉贡职之意,其事《韩世家》未载,可能指晋景公十一年(589BC)鞍之战与鲁、卫败齐,也可能指晋悼公十四年(559BC)使六卿率诸侯败秦。然而据《韩世家》“晋悼公之十年(在《左传》当晋悼公七年,点校本迳改为七年),韩献子(厥)老,献子卒,子宣子代”(《史纪》卷四五,第 2248 页),韩厥可能没有参与悼公十四年之役。

⑦ 《田齐世家》未载宗周之事,《鲁仲连列传》鲁连曰:“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史记》卷八三,第 2970—2971 页)若以此为“拨浊世而独宗周”,恐未当,疑“宗周”主要就威、宣时齐国的霸主地位而言。

⑧ 《史记》卷一三〇,第 3985—3991 页。

退之于列传的韩信,太史公惋惜地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曹参的战功多系追随韩信而取得,①其功勋远逊于韩信,结果曹参入世家、韩信降格为列传,说明“忠信”是进入世家的先决条件。然而,韩信是否真的谋逆,实际大有疑问,那么太史公看似严厉地指责韩信“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②其弦外之音可能在于,作为世家准入门槛的“忠信”,并非完全以主观动机为标尺。

中间八篇世家所“嘉”,对应东周“上无天子”即王道缺位的时代,情况最为复杂。作为一时霸主的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齐威王等,其获得《史记》褒嘉,并非都有佐助天子的行为,楚庄反而僭周“问鼎”;最能体现忠信的勤王行为,往往也不是出于忠心,例如晋文不过以“入王尊周”为求霸的手段。③尽管如此,按照公羊学说,他们作为贤“方伯”本身,就意味着为尸位素餐的天子分担其未能履行的职责,客观上有功于天下。故《晋世家》小序褒奖晋文公能够受天子“锡珪鬯”为霸主,忽略其践土之会召王的公然僭越,《魏世家》小序“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也间接说明晋文对于“主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霸”功。那么《楚世家》小序“嘉庄王之义”赞赏的也是庄王能为霸主,客观上为周室分担了维持天下秩序的重任。

更值得玩味的是,赵、魏、韩、田齐作为“诸侯—大夫”秩序的破坏者和僭号称王者,《史记》非但很少指责其犯上之罪,④反而嘉许赵和田齐勤王、宗周的忠信;实在找不出尊周行为的魏、韩,只能嘉许其先祖曾辅佐晋国成就霸业。⑤ 在此意义上,魏、韩的“主上”也应如赵一样是周室和天下,而不可能是小序字面所指的晋国。要之,作为世家准入条件的“辅拂股肱”和“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其“忠信”和“辅弼”均不必拘泥于主观动机,而是以对“主上”的客观贡献为标尺;“主上”与其说是天子其人,不如说是王室、王业、天下。

至此,世家应具辅弼之义应无疑义。最后的问题是,孔子辅弼的对象即“主上”是谁。已有的见解大体可分为周、汉两种。认为孔子尊周的,如清人姜宸英已注意到小序嘉许晋、越、郑、赵、韩、田齐尊周,由此指出孔子入世家的原因在于其与诸侯一样同尊周。⑥ 笔者对此未敢苟同,理由有三。

第一,缺乏《史记》明文。尽管周道即周之王道,但《史记》全书每言“周道”衰而孔子明“王道”及作《春秋》以达“王道”,诸如“周道缺……孔子明王道……(作《春秋》而)王道备”“周室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作《春秋》以当王法”“周道衰废……(孔子作《春秋》)以达王事”“周室既衰……(仲尼)追修经术以达王道”,从不说孔子明“周道”或者作《春秋》以达“周道”。这类表述不少,不应视为巧合。

第二,周道已亡。孔子的抱负是实现王道,假如梦想成真,王道或等同于周道,即重张周室对天下秩序的宰制,因有“从周”“为东周”之志。然而在现实中孔子屡屡碰壁,至西狩获麟宣告周道已然无药可救。“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孔子作《春秋》正是周道亡失的结果。

第三,六艺不独为周而修。孔子所“世”者,六艺也。《世家》于《诗》,言孔子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于《书》,言孔子上纪唐虞之际;于《礼》,言追迹三代、百世可知;于乐,言韶武雅颂;于《春秋》,言运之三代;⑦又《自序》于《易》,言伏羲作八卦:皆未局限于周。

---

① 《曹参世家》:“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史记》卷五四,第 2453 页。

② 徐复观认为:“史公以‘天下已集’的微言,断言淮阴无谋叛之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9 页。

③ 《晋世家》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史记》卷三九,第 1995 页。

④ 在相关世家的叙述中,《史记》总是暗示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主要责任在于晋和姜齐的公室。

⑤ 《赵世家》小序亦言赵衰“佐文尊王,卒为晋辅”。

⑥ 参见姜宸英:《湛园未定稿》卷五《读孔子世家》。

⑦ 《自序》于《春秋》亦言推三代之德。

总之,孔子可能曾有救周之心,但在现实中无路可走,其最终选择“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已不可能以兴周为志,且六艺的内容也超出了周。

另一种观点是孔子有功于汉。如朱东润认为:“史迁列孔子于世家,特以其立大经大法,为汉制作,虽身系周室之岁时,而功在汉家之社稷,斯则冠于萧、曹、张、陈之首可也。”①这类理解的好处在于,可以解释《孔子世家》排序何以处于《赵》《魏》《韩》《田敬仲完世家》之后。其问题在于,“为汉制作”作为公羊说,一则如上章所说,《史记》全书未见以《春秋》当新王的确证;一则意味着(尽管朱先生未必有此意)尊孔子为“素王”,就不会承认孔子作为“辅拂股肱之臣”的角色,也就不合《史记》世家之义。

倘若修正“有功于汉”的说法,去除其“素王”意味,把“为汉制作”调整为更宽泛的“为天下制仪法”,则更契合史迁之意。正如“六艺之统纪”不独为一王之法,而是如《世家》所说,“运之三代”、可以令“百世可知”;孔子所辅弼的也不是某一特定王朝,而是三代一贯、百王不易之道,即王道本身。

孔子用六艺尤其是《春秋》来辅弼王道,留待“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是本文对孔子何以入世家的回答。

## 四、《史记》继《春秋》以辅弼王道

尽管太史公不以孔子为“素王”、不以《春秋》当新王,以《春秋》达王道的做法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僭越之嫌。如所周知,《孟子》有云:

>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世家》用“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之说,究竟是同时承认了《孟子》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前提,还是不同意这一说法呢?

这个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假如《史记》明言《春秋》是天子事,则在《自序》中反复致意、以继孔子自期的司马迁,就不打自招地坐实了自己僭越汉天子的罪名。退一步说,假如史迁认为《春秋》中的“贬损”,只是纯粹的“史笔”,或所谓“批判现实”,《世家》又何必效法《公羊》的“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强调《春秋》需待“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呢? 所以孔子作《春秋》,以及子长为《太史公》书以继《春秋》,势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僭越,不论太史公是否承认。

只不过在《史记》的语境中,孔子所僭越的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②即《自序》引董生所谓“贬天子”。对于王道,孔子是辅弼之臣,绝不敢“少贬”。

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绝口不提周公、孔子的尊崇地位,③刻意将二者塑造为王道的鼓吹者和传承者:

>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在此意义上,担任太史的司马迁以继承孔子自任,便不会显得古怪:

>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

---

① 朱东润:《史记考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姜鹏在朱先生基础上结合公羊学,认为孔子、陈涉都起到了辅弼汉兴的作用,孔子受命,陈涉革命。参见姜鹏:《公羊学背景下的〈史记·孔子世家〉》,第 132 页。杜润德也依据公羊学说指出:“孔子为汉朝和之后的所有朝代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一个大臣所能提供的最高服务,所以孔子成为环绕‘北辰’最引人注目的星宿,按照这个逻辑,自然应该进入世家。”见杜润德著、丁波、丁慧添译:《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3 年版,第 57—58 页。

② 公羊家以孔子为素王,则不存在僭越的问题。

③ 例如周公制礼作乐,鲁国得用天子礼。

> 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

壶遂没有误会司马迁要学孔子成圣,但他抓住《春秋》的拨乱反正之义,质疑史迁躬逢盛世、要在何种意义上效法乱世中的孔子。面对如此敏感的发问,史迁连忙改口,极力否认“继《春秋》”的企图。实际上,《自序》末尾自道为《太史公》书以“俟后世圣人君子”,其比附《公羊》“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之意再明显不过。那么,史迁表面上否认“继《春秋》”,应视为对微文刺讥今上的一种掩饰。后世基于史迁对武帝的个人恩怨,贬《史记》为“谤书”,②这一污名虽有待洗刷,却也不算空穴来风。对本朝天子的褒贬,也堪称《史记》继《春秋》以载王道的题中之义了。

更令人在意的是,“五百岁”和“意在斯乎”的表达,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孟子》的名言:

>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③

如果套用《孟子》的逻辑,史迁的当仁不让或可理解为,自期继周、孔之后辅弼王道,甚至自期以“藏之名山”的《太史公》书辅弼未来致太平的“王者”。

# Why Could Confucius Be Included in the *Generational Annal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Li Lin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rationale behind Confucius' (孔子) inclusion in the *Generational Annal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世家)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史记》) does not primarily concern the historical figure himself, but Sima Qian's (司马迁) conceptualization of Confucius instea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Sima Qian positioned Confucius not as a paragon of moral perfection, but as the inheritor and transmitter of the kingly way (王道). *The Generational Annals of Confucius* centered on two principal themes: political engagement (为政) and the Six Arts (六艺). Both themes revolved around the kingly way: Confucius' pursuit of office and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 aimed to implement this ideal, though these endeavors ultimately failed due to their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prevailing ethos of "rule by force" (力政). His compilation of the Six Arts and authorship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春秋》) served to preserve the kingly way for posterity, so that "a future sage-king might revive and promote it (后有王者举而开之)". When contextualized with the emphasis on assisting rulers in the prefaces to other generational annal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Sima Qian's true intention to include Confucius in these annals becomes evident: to portray Confucius as an assistance to the kingly way. The "generational" legacy transmitted by Confucius resided not in lineage, titles, or benevolent virtue, but in the Six Arts as vehicles of the kingly way. Sima Qian, who saw himself as Confucius' successor, consciously assumed the role of the kingly way transmitter — a self-appointed position that inevitably rendered him a usurper.

**Key words**: *Generational Annals of Confucius* (《孔子世家》); Sima Qian; kingly way; stud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春秋学)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史记》卷一三〇,第 3973—3974 页。

② 班固《典引》序引汉明帝诏:“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文选》卷四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58 页。《后汉书·蔡邕传》:“(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卷六十下,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006 页。

③ 贾谊也说:“臣闻之:自禹以下五百岁而汤起,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故圣王之起,大以五百为纪。自武王已下过五百岁矣,圣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终于无状。及今,天下集于陛下……”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数宁》,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0 页。